

增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 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以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为例

张宏宏

古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丰富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知识,是人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古籍类型,少数民族古籍既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内容,也是中国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多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古籍的保存状况良莠不齐,存在地理隔离、保存状态不佳等问题,面临丢失和损毁的风险。因此,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加强收集整理工作、制定古籍整理规范、加强规范化建设、加大资源投入力度、提高技术水平、拓展古籍原始材料渠道、推进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动少数民族古籍图书出版等,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意识。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有助于提高社会各界对其珍贵性的认识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彰显其历史价值和价值。

二是提高保护和修复少数民族古籍水平。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可以积累并改进其保护和修复技术,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技术体系,促进相关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者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古籍信息,方便其开展相关工作。

三是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增强其保护与传承意识,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深入挖掘各民族在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资源,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少数民族古籍在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价值,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而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四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古籍记录了各民族的历史交流和碰撞,整理研究这些古籍可以让让更多的人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进而加强民族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友谊,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五是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少数民族古籍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通过整理研究这些古籍,可以深入了解古人的思想、哲学、道德观,为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六是研究中国历史提供多视角。通过整理研究这些古籍,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新颖

的观点,助力人们构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历史认识。

七是促进古籍文献学发展。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推动古籍文献学的研究,提高其学术水平和质量,进而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更加专业、系统、全面的学术支持。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的现状

图书出版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图书,可以推动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是针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的图书,既包括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及特定文化领域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修复、数字化等工作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探索和发展。它将少数民族古籍的研究成果推向更广泛的受众,不仅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研究和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承。

为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工作,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应运而生。自1986年起,全国少数民族古籍重点项目出版规划已先后制定并实施了7个五年规划,这些规划在内容上既相互衔接,又各有侧重,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开展,初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工作体系。在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中,少数民族古籍类共计17项入选。

近年来,在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和全国少数民族古籍重点项目出版规划的引导下,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西夏文献学研究丛书》《满文古籍编目概述(上中下)》《蒙古秘史》研究丛刊》《藏文古籍总目》等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这些图书涵盖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医学等方面,不仅为相关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也展现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取得的成果。

一是获得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政府部门在推动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如设立专项资金等,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出版的数量和种类有所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和支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的数量和种类均有所增长。

三是呈现多样化出版形式和传播渠道。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成果通过纸质图书、电子书、数字化展览等形式进行出版和传播,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四是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通过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实现了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目的。

五是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和图书出版,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是推动跨学科研究与合作。跨学科研究与合作有助于相关领域的编辑共享知识资源,让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更好地发挥作用。

七是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可以更好地传播传统的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识,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繁荣,提高民族地区民众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水平,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尽管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在市场需求有限、出版成本较高、技术与方法陈旧、宣传发行不足、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不多、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对策:

一是拓展市场需求。出版社要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选题,并为其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保障,加强包括原始文献、版本、翻译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等在内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的出版,拓展市场需求。

二是控制出版成本。在研究、开发、组织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时,出版社要在排版、编辑、印刷、装订、发行、储运等环节合理支出,控制出版成本。

三是创新技术与方法。在研究、开发、组织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时,出版社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的数字化。

四是加强宣传与发行工作。在完成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的设计、排版、印刷和装订工作后,出版社要加强相关图书的宣传与发行工作,提高相关图书的公众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相关图书,进而增加销售。

五是推动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在研究、开发、组织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时,出版社要注意突出少数民族古籍学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此促进其多元化和深度化发展。

六是促进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在研究、开发、组织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时,出版社既要充分吸收国际研究经验与成果,又要注重本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传承,以此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总之,我们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针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图书出版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而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传承的观念和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①石油工人捐款证书
②路易·艾黎为抗美援朝捐款
的凭证
③屈开元立功喜报
④1951年抗美援朝纪念章
⑤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立功证明书



⑤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从嘉峪关关城到虎山长城,70余年时光转瞬即逝,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革命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化作英雄的故事,而印证这些故事的,是陇原大地上的每一件革命文物。虽然甘肃距离抗美援朝前线千里之遥,但抗美援朝的精神至今在这片热土上传承。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局着力推动全省革命文物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组织相关纪念馆、博物馆开展革命文物征集、走访革命军人及家属、口述历史整理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革命文物保护及展示利用水平。

在走访和征集工作中,工作人员发现有关抗美援朝的文物来源明确、传承有序,背后所讲述的故事,反映了甘肃各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凯歌。

让我们跟随这些文物,重温抗美援朝战争背后的故事,汲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磅礴力量,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石油工人捐款证书(二级文物)① 1951年5月中旬,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回国后,反映了志愿军在作战中由于极端的装备差距而出现的困难情况,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明确任何人不得强迫摊派,不鼓励老百姓掏空自己的腰包,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利用业余时间劳动自愿捐款。

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玉门油田石油工人仅8天就增产捐款15.7亿元(旧币),为其捐献了一架“石油工人号”战斗机。

路易·艾黎为抗美援朝捐款的凭证(二级文物)② 1951年春,山丹培黎学校学生组织流动宣传队与全县人民一起声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正义行动。路易·艾黎在《旅华廿五年》中记载:“6月14日晚上,培黎的学习小组专门讨论了怎样援助在朝鲜的志愿军。”这件文物便是培黎学校代收路费、艾黎捐赠抗美援朝现金的收据凭证,收据长16.5厘米、宽9.5厘米,上面写有艾黎捐款2838960元(为旧币,折合今币约283.9元),两侧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该凭证属路易·艾黎遗物,原藏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友谊馆,路易·艾黎逝世后,珍藏于山丹艾黎纪念馆。

屈开元的1951年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立功喜报、1953年抗美援朝纪念章、伤残军人证、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鲜慰问团敬赠手帕(1套6件)(一级文物)③④

屈开元,1924年4月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二坝沟村。1951年5月参军,为原沈阳军区一军炮兵战士,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2月17日,荣立三等功。1953年4月,在援美援朝夏季反击战役中,屈开元身负重伤,回国后在原沈阳军区医院治疗、疗养。伤愈后于1954年转业回到肃南县工作,1995年与世长辞,享年71岁。

2002年6月,肃南县城隍镇郑凤英将丈夫屈开元参加抗美援朝的这些珍贵藏品捐赠给肃南县民族博物馆。

谢有财荣获的三等功勋章、三等功证书、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立功证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搪瓷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九三师军事教导营毕业证书及纪念章3枚(1套8件)(三级文物)⑤

谢有财,1932年10月17日出生于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鱼池乡下滩村。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九三师579团战士。1951年5月,跨过鸭绿江赴朝鲜作战,参加了朝鲜蟠龙山、军隅里战役,随后参加了仁川战役。在板门店和平谈判时,他执行警戒任务。1953年到原河北省宣化市休整,1954年10月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他在抗美援朝军隅里战役中荣获三等功,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三等功勋章及证书。2016年12月,谢有财将自己珍藏的这一套8件抗美援朝珍贵奖品交给了两当兵变纪念馆工作人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将士们逐渐离我们而去,但一件件抗美援朝革命文物仍然在纪念馆的展厅中熠熠生辉,带领我们跨越时空,引领我们继续发扬抗美援朝伟大精神,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本文是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红色记忆 甘肃丰碑——甘肃省革命文物讲述的红色故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为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永平)

抗美援朝文物讲述甘肃故事

李永平 刘木子

云南建水窑明代青瓷嬗变之因

贾腊腊 郁永彬 张茂林

云南省南部红河北岸的建水县,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为陶瓷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条件。《建水县志》记载:“昔江西景德镇人尝用以饰瓷器”,正说明这一点。学术界对云南青瓷的研究主要关注考古学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对推动云南青瓷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云南建水窑明代青瓷嬗变之因的历史背景、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丧葬习俗和市场需求做简要分析。

历史背景

云南处于中国西南边陲,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元代时期在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建立云南行省。元代以后大量中原人涌入云南。随着不少陶瓷手工业者的涌入,致使施釉制瓷工艺传入此地,而建水也因此发展成为滇南文化中心 and 贸易集散地。由于当地窑工将不同窑口的特色,如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制瓷工艺融入地方窑口,加之地区差异以及所用原料和加工工艺不同,逐渐使云南各地生产出兼具地方民族特色和时代共同风格的瓷器。

明清是建水文化大发展和特色文化形成时期。明代中后期,云南与内地交往频繁。由于人口骤增,地方生产的瓷器已不能满足民众基本需要,加之景德镇瓷器大量输入且品种繁多,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并以其质地优良之势而取代地方瓷的位置,阻断了云南当地瓷器的销路,使其产品过剩、价格低廉。随着云南瓷器的逐渐衰落,地方部分瓷窑不得不改为烧造粗瓷和细陶。

交通运输

建水距昆明220公里,地处滇南交通要冲,有着一千多年的建城史;秦开“五尺道”后,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汉代先民开辟了自滇池地区向南行经蒙自、屏边、河口进入越南的国际通道“马援古道”,它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二条通道。唐宋时期,又开辟了经建水沿红河至越南的“步头古道”,建水即成为中国通往越南的咽喉要地。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销往东南亚诸多国家,先进的农艺、制瓷工艺和文化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国外的商品和文化也输入中国,促进了内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元代置临安、广西、元江等地宣慰司兼管万户于

建水后,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佛教、交通的中心和贸易集散地。其影响力辐射玉溪、楚雄、大理等云南腹地,向东可经红河由河内、海防出海。综合来看,建水窑并非仅针对本地市场的小型窑场,应是区域性的瓷业生产交流中心。

自然资源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南部,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云南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缩影。从新石器时代便开始烧制陶器,由最初的陶器、釉陶到青瓷、青花瓷,以及后来的黑陶和紫砂等。限于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制作陶瓷原料多就地取材。这主要取决于建水矿产资源丰富,有陶土、紫土、瓷土、铁矿、石材、河沙等,尤其是陶土中氧化硅、氧化铁含量较高,致使陶器烧成温度较高且胎体多呈灰色。碗窑村坐落在草木茂密的山林,坡地利于搭建龙窑。全村地表均是陶土,分布面积广,厚度约为4米至6米,村北的杨家沟、黄家冲、望城坡附近所藏陶土质量最佳,白黏土、黄黏土、红黏土含量较多,开采也相对容易,因此产品质量优于云南其他地区。

丧葬习俗

云南自南诏起实行火葬,火葬墓是以同宗、同族,共同信仰佛教密宗为原则的公共墓地,基本分布在以白族或彝族为主的村子附近山坡上。从葬具看,南诏至大理时期陪葬品较少,有浅圈足釉陶碗,泥质细陶、绿釉陶占主要地位;北宋末至元代,葬品种类增多,有圈足釉陶器和绿釉陶;元代云南仍盛行火葬墓,其早期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中晚期出土的瓷器以青釉罐、瓶为主,景德镇元青白釉碗盘逐渐增多,并有元青花瓷、龙泉青瓷的发现。元末尽管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青釉青花,但不能取代部分泥质陶和釉陶的生产。

明清时期,云南地区以江南籍、江西籍移民为主体,主要分布在交通沿线和黔中、滇中、滇南和滇西南地区。此时云南呈现江南、江西特色。受中原文化影响,明代改为棺葬,但在云南腹地,棺葬和火葬并行,火葬以云南青釉、青花为主,或者陶、瓷并存随葬,做工不精细含杂质且器形不完整。如明代镇守边疆的墓葬以云南青花和永乐白釉为主;土坑墓以云南瓷器居多,主要是在明初至明晚期的红河地区。明代中期以后,除边远民族地区外,交通发达地区的墓葬随葬品基本是景德

镇瓷器,以青花为主,丽江、禄丰、腾冲等地的窖藏以景德镇瓷为主,云南产的青釉、青花则越来越少。而以陶俑随葬的石室木棺墓,流行于嘉靖时期,多为府一级官吏的墓葬。云南最高统治者黔宁王沐氏墓地陪葬品主要是金银铜铁锡器,将军郭氏墓的出土物主要为铅器。明代云南由于移民棺葬的兴起,景德镇瓷器的输入和火葬习俗的禁止,逐渐改变了以烧陶、青釉瓷为主的面貌。

市场需求

云南青瓷是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民窑产品,与其他地区的青瓷相比,在器形和精细化程度上都有所欠缺。一是颜色不够稳定;二是国内日渐发达的交通物流状况,使得省外产品大量销往云南,侵占本地市场。据《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记载,南方土司主要贡物为马、象、犀角、孔雀尾、玉石、槟榔、黄蜡等。其中并没有瓷器,可知瓷器在明代时期并非朝贡之物。

从云南窑址、墓葬、窖藏等出土物看,元明以来,陶瓷生产集中于碗窑村,这里散布着多座龙窑,陶瓷器残片、窑具以及生活用具。从墓葬出土物来看,元代墓葬出土随葬品主要是青釉器;元末明初至明晚期的土坑墓以云南瓷器居多,主要是在红河地区。火葬墓出土随葬品基本以青花为主,而且主要是随葬在将军及以下等级的墓葬中,即瓷器较金银器地位低。故此可知青瓷在明代较青花产量少,并且主要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用具。

因此,笔者认为云南窑工根据其本地特色和习俗,在原有的制瓷原料和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对元代晚期引入的龙泉窑制瓷技术不断改进,在明代中期生产出质量较高、风格与龙泉窑较为相似却不失当地特色的青瓷产品。而明代晚期由于景德镇青花瓷器及其制瓷技术的大量输入,对云南瓷器的销路及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当地制瓷工艺和产品质量下降。另外,碗窑村北面的杨家沟、黄家冲、望城坡附近所藏陶土质量最佳,最开始烧制陶瓷时质量是否较佳,而随着时代发展,制瓷业的不断进步,原料质量较早期差从而产品质量降低等均未可知。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陶瓷之路”视域下景德镇清代釉上彩瓷综合研究(22VJXG025);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史视野下景德镇陶瓷工业考古及工业遗产保护研究(21LS11);江西省教育厅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211326)的资助